

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第
①
辑

Big Data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付海晏 徐剑 主编

- | | | |
|-----|------------------------|-----------|
| 3 |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计量研究与政府统计资料利用 | 马敏 陆汉文 |
| 34 |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 梁晨 董浩 李中清 |
| 159 | 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 李伯重 |
| 184 | 大数据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 | 周欣平 |
| 199 | 计量史学漫谈 | 袁为鹏 |

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第1辑

付海晏

徐剑

主编

Big Data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第1辑 / 付海晏, 徐剑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201-0761-7

I. ①大… II. ①付… ②徐… III. ①数据管理-应用-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399 号

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第1辑)

主 编 / 付海晏 徐 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陆 彬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761-7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刊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量史学在海内外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计量史学或定量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最近耶鲁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全面阐释了计量史学的重要性。

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李中清教授，作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倡导者，也是将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分析历史数据的先行者。他和他的研究组把历史的和当代的档案资料、社会调查、家谱、碑铭及口述历史联系起来，创立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从18世纪一直延伸到21世纪的大规模个体数据资料。在继此前人口史、经济史计量研究的突破性贡献之后，2012年完成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在《中国社会科学》刊发后引起重要社会反响，次年出版的同名专著以扎实的数据证明了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保持社会公平具有积极作用，对今后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该书出版后，受到俞正声、刘延东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华中师范大学在章开沅先生的带领下，长期以来在社会经济史、教会大学等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在计量史学方面，1997年当我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后，曾开始从事“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这项研究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尚不足的薄弱环节，借鉴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现代科技，突破传统史学模式，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并进而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一个比较可信的参照系数，除

先后发表《建构民国时期（1912～1949）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等文外，还主编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限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2009年以来，我有较多的机会参加国际经济史学会（IEHA）举办的各种活动，特别是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学者代表当选国际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在评审各国学者提交的小组议题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大数据、数据库的利用与研究，事实上使用数据以及数据库也是国际经济史学会确定的重要遴选标准之一。

自2013年开始，华中师范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开始在大数据历史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2015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大数据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基地班，在国内率先开展共同培养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中清院长、李伯重教授先后被聘任为我校特聘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康文林教授通过长江学者客座教授评审。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大数据历史专业开设了诸多较有特色的专业课程，其中“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系列讲座系高等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每年邀请海内外十余位在量化历史研究、数字人文研究方面素有专长的资深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做专题讲座，本刊收录了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演讲稿，今后将每年出版一本，力争将《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系列专辑打造为一个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教授为大数据历史专业开设了 A New History of a New China（新中国、新历史）、Big Data and New Methods i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ollection, Transcription, Analysis（大数据与新社会史研究）等具有特色的课程，在今后合适的时候，我们也将根据课程内容出版相关的系列教程，组织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期待为国内外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研究以及人才培养贡献一份力量。也期待通过这样的诸多努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一起参与、引领“大数据历史”这一最新学术潮流，在重大研究领域、研究问题、学科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从而带动历史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新发展。

马敏

2017年2月17日

目 录

· 专题研究 ·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计量研究与政府统计

- 资料利用 马 敏 陆汉文 / 3
-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梁 晨 董 浩 李中清 / 34
- 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
- 以 GDP 的测算为中心 倪玉平 徐 毅 范鲁文·巴斯 / 58
- 从脚注中发现经济史：统泰升档案
- 旧事（1790 ~ 1850） 马德斌 袁为鹏 / 75
- 周学熙实业生涯中的社会网络关系考察 段 钊 谭艳平 / 90
- 北洋时期基层诉讼的规模、效率及结案方式 唐仕春 / 109

· 讲座实录 ·

- 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 李伯重 / 159
- 大数据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 周欣平 / 184
- 计量史学漫谈 袁为鹏 / 199
- 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民间资本的地位和作用 朱荫贵 / 218
- 稿 约 242

Contents

Special Study

-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Utilization of Government Statistics *Ma Min, Lu Hanwen / 3*
- Databas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Liang Chen, Dong Hao, James Z. Lee / 34*
- A Study on the Estimation of the Economic Total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Period: Taking the Measurement of GDP as the Center
Ni Yuping, Xu Yi, Bas van Leeuwen / 58
- Discovering Economic History in Footnotes: The Story of the Tong Taisheng Merchant Archive (1790 – 1850) *Ma Debin, Yuan Weipeng / 75*
- A Study on the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of Zhou Xuexi's Industrial Career
Duan Zhao, Tan Yanping / 90
- The Scale, Efficiency and Closing Mode of Grass-roots Litigation in Beiyang Period
Tang Shichun / 109

Lectures

- Big Data and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Li Bozhong / 159*
- Big Data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Zhou Xinping / 184*
- On the Study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Yuan Weipeng / 199*
-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Folk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Zhu Yingui / 218

专题研究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计量研究 与政府统计资料利用^{*}

马 敏 陆汉文

民国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的分析，以提升史学成果的准确性、科学性。“现代化史”分析框架的引入，曾一度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研究者从社会演变的另一角度来思考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现代”的二分，或若干现代化模式的宏观描述上，我们的史学未免再一次显得苍白、无力。现代化阐释框架目前正在被形形色色的“后现代化”思潮蚕食、挑战，便是一个明证。为此，以统计资料为基础，通过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无疑便成为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史（1840～1949）研究的关键之一。本文尝试沿此方向进行初步探索：第一部分介绍计量史学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概念和思想，第二部分阐述构建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石与原则，第三部分分析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具体内容，第四部分梳理民国时期主要统计活动与统计资料，最后讨论政府统计资料在民国社会发展研究乃至整个民国

* 本文系作者根据推进大数据史学相关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对此前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的整合。这两篇文章分别为《建构民国时期（1912～1949）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和《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史研究中的价值。

一 计量史学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20世纪50年代，计量史学自法国滥觞，旋即西征东伐，掀起史学界的轩然大波。一大批运用回归分析、相关系数、方差分析等计量技术的“新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向传统叙事式人文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招致一轮轮的指责。无须赘述计量史学的远大科学抱负及其卓越成就，也不论其反对者或中肯或武断的辩驳与诘难，计量方法由此所展现的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具有深厚、悠久人文史传统，习惯于粗放式耕耘的中国史学界来说，这种意义尤为重大。

计量史学的灵魂是：在特定理论指导下，对历史做准确的结构性的数量分析，进而概括出关于历史的科学结论。由是，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便可归结为：一个个具体的具有内在情感与好恶的个人所创造的历史能够经由结构性的数量描述而再现吗？反对者以为，离开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背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就不可能接近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论争。因此，厘清100多年来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论争的实质，是理解计量史学及其方法论意义的关键。作为一种方法论主张，人文主义强调经验的不可重复性、主观性，认为在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不存在全称假说，不能建立因果律、统计律，而只能用诠释、理解的方法去做恰切的观照。实证主义则针锋相对，肯定经验的客观性、可测性及普遍定律的存在，坚持演绎说明是科学认识的最好模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概莫能外。但事实上，根据哈贝马斯及阿佩尔的观点，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并非水火不容，人文主义所要理解的是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中需要理解的一个侧面，实证主义所要实证的则是同样领域的另一个侧面，两者回答的是纷繁世界的不同问题。^①因此，关于计量史学的争论便也有了消解的可能。计量史学无法取代人文史学，同样，人文史学也不应苛求计量史学。历史需要理解，理解一个个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背后深刻而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内

^① 江天骥：《略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蕴；历史也需要计量，计量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所显现出来的不同经济、社会、行为乃至文化心理特征。就此而言，我国史学界有理由更重视计量史学研究，通过数量分析提升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以补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人文史学一家独大之缺。

晚清时期，社会统计资料十分零散，统计手段也不甚科学，留下的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系统的统计资料甚少，给计量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民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统计制度始逐渐建立起来。民国初年，曾有主计局等组织，负责一些统计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于统计行政之划一，以及政府统计制度之确立，厘定法令，用策厉行”。1931年，国民政府设置主计处，“掌理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依主计法规之规定，主计处统计局掌全国统计总报告之汇编，及分类统计年鉴之纂刊。”^①1935年，统计局汇编第一次全国统计总报告，并提要刊行《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②此后，虽然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统计事务受到极大破坏，但统计局仍坚持工作，于1940年、1947年两次汇编全国统计总报告，并提要刊行。这些综合性统计资料和各种部门统计资料的内容涉及土地与人口、生产事业、商业、货币金融、财政、交通、教育、政治、国际比较等众多类别，类之下又再分纲、目、栏等，并且注重历年之比较、各省之比较及各辑之间的联系与一致，数据相当全面翔实，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另外，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过一些调查统计，也留下了丰富的统计数据资料。这些数据为计量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和便利。因此，民国史的计量研究更有理由得到重视。

笔者认为，最能够彰显统计资料在民国史研究中的综合价值的是社会发展研究。社会发展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一种定性的描述，还是一种可以用指标体系加以观察的社会发展状态，是一种可测度的社会现象。这里所谓的指标是表示一个概念或变量的可观察、可测量的具体事物。一系列具有内在结构和逻辑关系的指标经理论整合即构成相应的指标体系。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以

① 陈其采：《〈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序》，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商务印书馆，1940。

②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商务印书馆，1935。

GNP 来度量经济增长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被经济增长所代替，经济增长又主要由 GNP 等少数几个经济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来反映。这就是传统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经济性指标体系。60 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性指标体系的局限性，即经济增长不等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等于社会进步，遂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及相应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根据有些研究者的归纳，新发展观包括综合发展观、人本发展观、社会整合观及可持续发展观等几种不同的具体形态。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人本发展观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整合观强调社会发展各要素的相互联系、和谐有序、灵活有效及一体化运作。可持续发展观则突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自然资源总量和总体上的生态完整，进而实现社会持续进步的价值优先性。^① 不论哪一种具体形态，都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全面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因此，与新发展观相对应的就是包括经济指标在内的注重社会全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

社会发展指标可解释为：“量定某一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数的材料”。^②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依其功能可以区分为描述性指标体系、评价性指标体系和规划性指标体系。描述性指标体系通常是政府制定出来用以详细记录当时社会发展各方面变化情况的统计体系，像统计年报表、月报表之类，凡可以统计的内容都应囊括其中，比较具体、翔实、细致，因此，具体指标通常很多，常常有数百乃至上千个。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以及当代中国的《中国统计年鉴》即属此类。评价性指标体系旨在以描述性指标体系为主要依据，选择确立尽可能少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些指标全面概括社会发展，达至对长时段社会发展状况或不同地域、国家的发展水平的总体性认识、评价和比较。其特点是少而精，注重从量与质的结合上把握人类社会的深层次脉络，既具备历史的纵深感，又具备空间上的延展性，从而能够作为认识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有效工具。

^① 宋林飞：《社会发展的评估与对策》，《南京社会科学》1998 年第 4 期。

^② 郑杭生等：《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 25 页。

二 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石与原则

建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为了提供一种新的可资认识、评价民国史并能够对勘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工具，因此，毫无疑问，要建构的是一种评价性指标体系。如前所述，指标体系是具体指标的结构性聚合，而其结构，取决于作为其理论基石的发展观。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评价性指标体系，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作为其基石的发展观。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即中国人对国强民富或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向往与追求，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作为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理论基石的发展观应该能够抓住这种长时段特征。由此出发，新发展观当是恰切的选择。反观历史，尽管民国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新发展观，但由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全面变迁，中国人的求富逐强、救亡图存本就是一种笼统的整体性诉求，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基于新发展观而建立起来的反映社会全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去分析和评价民国历史。更何况，历史不仅是一代又一代人主观能动地追求与奋斗的历程，更是一个客观自然过程，历史上没有明确提出新发展观，并不表明以此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就没有发展。因此，运用新发展观下的社会指标体系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评价是完全合理的。新发展观凸显发展的动态性和连续性，不仅关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卫生水平等主要反映当时富裕、发达程度的具体指标，而且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关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递嬗，以及制度创新与变迁等等。简言之，即关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扫除及条件的创造。在新发展观下，真正的发展必然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全面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必因制度、人口素质等其他某些方面的落后或不适应而难以长久，单纯的制度创新也同样会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支撑而难以扎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从社会指标的含义及新发展观出发，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应该遵循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简约性等基本原则。

时代性。我们所要建构的指标体系是用来认识、评价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因此必须紧扣那一时代的主题，突出那些与该时期发展实际

相联系的社会指标。这就要求在建构指标体系之前对民国史有一个定性的把握。诚然，建立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本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当时的社会发展，但是，以数量化为特点的指标体系的建立本身又需要以一定的定性认识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大致把握了民国史的基本特征，才能够建立起对应的指标体系，准确地勾画出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面貌及其时代特点。反过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量化分析又必然能够导出关于民国史基本特征的更准确结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社会指标体系前提的定性认识构成挑战或补充。这样，定性认识与指标体系的概括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各自独立，共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要以某些得到普遍认可的关于民国史的已有结论为前提。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民国时期至少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民国时期战争频仍。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财富，也造成了大量伤亡人口，对人口增长率、人口预期寿命等指标，对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当时中国的发展主题、道路和模式构成了巨大影响。其二，中华民国不具有完全主权，也一直未能有效控制整个国家。因此，不同地域的发展目标、发展环境、发展政策、发展路径及发展成效可能都存在较大差异。忽视这种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其三，民国时期，即使西方国家也只是强调经济增长，并没有意识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而中国连经济增长都成问题。因此，社会发展在民国时期首先诉求的是和平，是有家可归、有食果腹、有衣蔽体，舍此而外，就谈不上发展。有些指标现在看来是层次比较低的，在当时却可能至为根本、关乎民生。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必须凸显这类指标的位置。其四，虽然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民国初期已历时数十年，但即使是到了民国后期，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之久，由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官僚政治所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应该认真审视这些特点，关注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及其障碍，关注制度创新及其社会心理环境。

可行性。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若在实践中行不通，理论上再完善精致的指标体系，亦不过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既要注重理论

方面的要求，也要考虑实践上的可能，要从民国时期的历史实际出发，保证各项具体指标的经验可测性。中华民国是已经逝去的历史，只能以现存史料作为建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前提。因此，在确定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及具体内容时，首先要深入了解、分析包括《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在内的有关统计史料，把握民国的计政制度和统计方法，搞清楚民国统计机构采用了哪些指标；其初衷是什么；各个指标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有相应的统计数据；若没有统计数据，是否可以根据其他资料估算出来或者使用其他替代指标；不同年份的统计口径是否一致；各种数据是如何收集的；其可靠性如何；除官方统计外，还有哪些资料可资利用；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可比性。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应该能够测出此一历史时期中至少两个不同年份的发展水平，从而可以用作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研究的工具，分析、比较当时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该指标体系还必须具备与现代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一致性，从而使历史和现实具有可比性。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时，要以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指标体系为参照系，认真分析其构成、内涵及使用方式，抠出那些代表性强、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核心指标，进而确定依据民国史料能够取得数据的相应指标，以保证指标体系的大致可比性。

简约性。社会发展千头万绪、林林总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全面、详细地描述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需要建立庞大的统计指标体系，即描述性指标体系。评价性指标体系以特定的发展观为理论基石，强调各项指标的理论联系和逻辑关系，旨在描绘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概括、评价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利弊得失及内在规律。这种指标体系应简明扼要，通过少量有代表性的关键指标，提纲挈领又不失精当地反映社会发展状况，而不是像统计机构的统计报表那样，指标众多，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因此，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需要在时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基础上讲求简约性，以尽可能少的指标达到从总体上对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把握，并能够进行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

三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

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包括的具体内容很多，关键是如何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建构评价性指标体系，以便对社会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简明扼要地抓住其主要特征。笔者以为，在新发展观指导下，根据民国时期的具体情况，可以从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文化教育与心理状况等三个方面建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以期全面把握当时的发展水平，并与世界各国及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相参照。

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了人，而人首先必须能够生存，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生活物品。因此，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 因此，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应该是反映迄今为止的任何社会任何阶段的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对于民国时期来说，由于社会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商品经济与民族工业都有一定发展，工业化正在起步，由于经济增长与强权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旋律，所以，这类指标对于衡量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尽管不似现在发达与富裕，但也涉及很多部门，如农业、工业、交通等，都需要相应的指标去量度。根据民国时期的统计体例，可以将这方面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概括为三类：经济指标、城市化指标、交通指标。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从一产生时，人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活动就是群体性活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任何个人都必须与他人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脱离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人也就不能其为人。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群体生活也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社会发展程度必然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量与质表现出来，通过人与人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